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数字时代劳动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许玉莹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7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要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探索，经历了从“精神抽象的人”到“感性抽象的类本质之人”到“现实的人”的三阶段演进，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确立了以实践和社会关系为根基的科学人学范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的本质不是先验生成的，而是在历史性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虚拟社交与算法管控重塑了“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也催生出更为隐蔽的主体性困境。本文以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为理论基石，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数字劳动背景下“现实的人”遭遇的主体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主体性复归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现实的人，数字经济，异化劳动，劳动者主体性

From “Abstract Man” to “Real Man”: A Study on Labor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Yuying Xu

Institute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C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27, 2026; accepted: July 19,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Marx's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man underwent a three-stage evolution—from “spiritually abstract man” to “sensuously abstract man of species-essence” to “real man”—ultimately establishing, within the horiz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cientific paradigm of human studies grounded in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Marx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is no abstraction inherent in each single individual. In its reality it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This implies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is not a priori given, but rather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historical 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labor, virtual social interaction,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have reshaped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real man,” giving rise to more concealed predicaments of subjectivity. Taking Marx’s thought on “real man”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s the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redicaments of subjectivity encountered by “real ma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labor,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subjectivity.

Keywords

Real Man, Digital Economy, Alienated Labor, Labor 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技术已深度覆盖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催生出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平台为关键生产工具的全新劳动范式。在数字劳动的图景中，个体在网络平台的日常行为都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虚拟平台的数字傀儡。技术乐观主义者宣称，数字劳动将人们从传统雇佣劳动的时空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劳动者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自主性。然而，表象之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悖论：技术的解放叙事恰恰掩盖了新型剥削的实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探索，为破解这一悖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坐标。

2.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理论演进

2.1. 从抽象到现实：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三阶段演进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探索，是在理论批判与现实反思中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审视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其思想的演进历程就是不断摆脱抽象化认知，持续走向现实化、具体化、历史化的过程，最终完成对传统抽象人性论的超越，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现实的人”理论。

2.1.1. 萌芽时期：“精神抽象的人”

中学时期，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尊严、道德理想与自我完善，这是马克思最早探讨人的价值与本性的文本。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未触及人的现实规定性，只是从道德观念与精神维度定义人，将人塑造成观念之中理想化、抽象化的精神形象。

大学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深受费希特、黑格尔和鲍威尔等人的影响，把自我意识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这一时期在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人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的存在服从于精神的逻辑演绎。马克思虽然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但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并不纯粹指抽象思辨中的个体，而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感性世界的经验个体。也即是说，马克思虽然在感性的、经验的层面探讨人的本质，但他也重视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表明马克思开始逐渐将哲学置于现实生活之中思考和研究。

2.1.2. 过渡时期：“感性抽象的类本质之人”

1842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在接触现实社会问题时逐渐认识到，国家、法律、道德并非抽象理性的产物，而是根植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与市民社会。这一现实冲击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依靠抽象思辨无法解释现实世界，必须从客观社会现实出发理解人与社会。

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走出了绝对精神的界限，开始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存在。通过吸收“类存在”学说并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将劳动引入人的本质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的经典论断。马克思通过将人的本质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突破了纯粹观念论的桎梏，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向。但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还带有抽象人性论的痕迹。

2.1.3. 成熟时期：“现实的人的确立”

1845年前后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实现质变的关键节点，这一阶段，马克思意识到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人。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称《提纲》)问世，马克思彻底清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理论弊病，正式确立实践的核心地位，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已经从类本质角度转向社会关系的角度。至此，抽象的人学范式被打破，“现实的人”正式成为马克思人学的核心范畴。

1845年至1846年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表明马克思将对人的研究纳入历史科学的范畴，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体系全面建成。马克思在《形态》中系统阐释了“现实的个人”所具备的三重规定性，一是现实的人首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二是现实的人始终处在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之中，三是现实的人是历史生成性的存在。在《资本论》及其晚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现实的实证分析，反复验证“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这一核心观点，让“现实的人”理论从抽象的哲学论断转变为能够解释、批判现实社会的科学武器。

2.2. “现实的人”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意义

综合马克思各时期的论述，“现实的人”理论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实践性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不是抽象的思辨存在，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体。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通过劳动，人不仅改造了外部世界，也在不断确证和丰富着自身的本质力量。第二，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规定。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说明，社会关系关系人的本质存在，理解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本质规定性也会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为我们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存在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工具。第三，人的本质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只存在不断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的本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强调这种关系是历史的、变化的”——这意味着，当社会关系被技术重构时，人的本质也随之面临新的规定与挑战。

在数字时代，社会关系本身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重构，个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地借助数字平台完成，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变化都受到算法逻辑的深刻影响。因此，将“现实的人”置于数字语境中加以考察，既是马克思人学理论在当代的延伸，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人的生存状况的新变化。

3. 数字劳动下“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困境

3.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异化”原本是法律和经济用语，表达的是物品所有权的转移——“原来是我的，现在不再是我的”。

在 17~18 世纪, 异化概念开始作为哲学用语被广泛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1844 年,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提出“异化劳动”理论, 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的经济事实出发, 提炼出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 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在私有制条件下,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本应是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 却变成了一种与他相敌对的、统治他的“异己的对象”。二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在自身的劳动中不断地否定自己, 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而成为劳动者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一种手段。三是劳动者同在自身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补充到,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类本质”指的是人区别于动物、能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的创造性特质。马克思指出, 异化劳动将这种体现人之为人的创造性活动贬低为动物性的生存手段, 使人同自身的本质相分离。四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 “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 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当人与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类本质都对立起来时, 人与人之间也必然产生对立。

3.2. 主体性困境的主要表征

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框架, “现实的人”在数字劳动中遭遇了深刻的主体性困境, 劳动者作为能动、自主、有创造性的存在, 其主体地位面临消解。

3.2.1. 劳动者主体性的消解: 从能动主体到算法客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劳动的本质: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塑造力量, 更是人的主体性得以确证和展开的方式。在数字劳动背景下, 这一逻辑发生了深刻变革。

数字生产方式并不是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取代, 而是在产业生产方式上叠加了一个更基层的数字结构^[3]。数字劳动将劳动过程拆解为标准化、碎片化的数字任务, 并通过算法隐形规训对劳动者实现全域控制。有学者通过对平台“智能调度系统”的分析揭示, 平台将劳动者转化为“数据节点”, 劳动者的行为路径、工作时长、绩效评分等皆被实时量化, 形成动态更新的“数字绩效档案”^[4]。表面上看, 劳动者可以自主且自由地完成劳动任务, 实际上其劳动价值被窄化为可计算数据。这种量化管理方式不仅消解了劳动者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也使其从能动的实践主体滑向被技术系统支配的客体。有学者研究指出, “数字劳动者面临普遍的主体性困境: 一般数据同人的对立导致主体性力量的式微; 不稳定的劳动使人的生存焦虑日益加剧”^[5]。

3.2.2. 劳动价值的中介化: 从自我实现到数据供给

数字劳动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劳动的对象、工具及其价值生成机制。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而数字时代的“自然”正在被数据所重塑。在数字时代, 劳动对象从物质性实体向信息化数据拓展, 数据成为核心的劳动对象。数字劳动以数字技术为关键生产工具, 以生产数字化产品和提供数字化服务为目的。

在数字劳动的运作逻辑下, 劳动者难以直观感知自身劳动与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 传统的“劳动实现自我”的叙事被技术的中介性所消解。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确证”, 但在技术逻辑主导下, 这一确证功能被遮蔽, 劳动的价值被窄化为数据的被动供给。数字平台“通过算法优化打破劳动时

间限制，延长劳动时间；通过数字平台打破空间限制，不断加强劳动强度，导致劳动者主体性羸弱”。劳动不再被劳动者体验为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仅仅是一种被技术系统所调度和评估的活动。

3.2.3. 劳动关系的原子化：从团结协作到个体碎片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 p. 163)数字技术重构了劳动的组织形式与联结方式，使传统劳动关系中人与人、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被系统性地瓦解和替代。

过去在车间、办公室中形成的团结协作、集体协商，正在被个体化、碎片化的劳动模式所取代。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虚拟化。个体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社交行为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平台上的数据流量成为衡量社交价值的核心标准，真实的人际互动被虚拟的数据符号所中介。平台通过技术垄断与算法控制，全面重构了数字劳动关系的权力结构，进而加剧了数字劳动者的不平等地位。此外，数字资本家牢牢掌握着数据平台的控制权，全面重构了数字劳动关系的权力格局。这种异化是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的颠覆。

4. 数字时代“现实的人”主体性复归的可能路径

数字时代主体性的复归，不能简单地以“反技术”的姿态出现——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在理论上是倒退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5]。马克思从来不是技术发展的反对者，他认为解放不是退回到某种想象中的原始状态，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因此，走出主体性困境的路径不在于放弃技术，而在于改变驾驭技术的社会关系，使数字技术从异化工具回归赋能本位。

4.1. 技术治理：推动算法的透明化与可协商

技术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将技术从单向度的管控工具转变为劳动者可以参与和协商的公共资源。数字技术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其本身并不具有异化的属性，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技术应用的单向度统摄。当前数字劳动领域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算法系统运作的“黑箱”状态。因此，技术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打破算法权力下的“黑箱”状态，建立透明、可协商、可问责的算法治理机制。让劳动者的成果有迹可循、公开可见，使劳动者从算法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知情参与者”。

其次，技术治理的核心在于重塑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维度。当前数字劳动的一大悖论在于：技术越是先进，劳动者的自主判断和创造性发挥的空间反而越是被压缩[6]。真正的技术赋能应当是通过智能辅助系统帮助劳动者优化决策而非替代劳动者决策，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而非规训行为，利用平台协作强化劳动者之间的联系而非将其原子化。这意味着，技术设计本身应该进行价值层面的转向：从“如何最大化资本效率”转向“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和激发人的主体性”。

4.2. 制度变革：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治理

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然而，这些数据主要由少数平台集中占有和支配。有学者指出，“在数字经济的运作体系中，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但其所有权归属问题却陷入结构性困境”[5]。平台化空间下数据的集中占有是主体性困境的制度根源，劳动者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据，却失去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控制。

为此，需要探索一种新型的数据治理模式，推动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治理。有学者提出“构建数字生产资料共享机制重塑劳动主体性”[7]。具体而言，可以运用“共票”理论完善数据利益分享机制，

让更多的消费者、普通劳动者等数据主体能够公平分享数字经济红利。近年兴起的“数据合作社”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有益探索——使个体能够集体控制、管理和受益于自己的数据。伴随着数字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数字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数字生产资料的共享将为主体性的复归奠定物质基础[5]。当数据不再是被集中占有的私有财产而是可以被集体治理的公共资源时，劳动者才真正有可能从“数据附庸”重新成为数据的主人。

4.3. 主体建设：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自主意识

数字时代主体性复归的最终动力在于劳动者自身。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建设，首先意味着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当前，大量数字劳动者并未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的处境，他们将平台的算法控制视为理所当然的技术规则，将自己的数据贡献视为无关紧要的日常行为，将劳动自主性的丧失解释为“灵活就业”的应有代价。这种无意识的被动状态是造成主体性困境最深层的维度。

打破这种被动状态，需要劳动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和数字权利教育的普及，帮助劳动者重塑批判能力。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新劳动群体及其共同意识的形成是实现数字劳动主体性解放的基础”。更深层的主体建设在于劳动者自主组织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培育。在个体化、碎片化的数字劳动形态下，劳动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被系统性地削弱，这恰恰是形成主体性困境的主要原因。重建劳动者之间的联系，无论是通过线上社群还是线下组织，都是主体性复归的应有之义。

5. 结语

从“抽象”到“现实”，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这一演进轨迹，立足于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持续探索。数字时代的到来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从现实维度来看，数字时代的降临并未如技术乐观主义所预言的那般将人类引向一个自由与解放的新纪元，反而以一种更为隐蔽、更为全域化的方式将异化劳动的逻辑推向了新的高度。数字劳动中“现实的人”面临的主体性困境是多维度的，这些困境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驾驭技术的社会关系。当技术服务于单向度的效率追求时，它必然成为劳动者主体性消解的加速器。然而，“现实的人”从来不是被动接受社会关系规定性的存在。人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改造者。每一次算法规则的透明化、每一项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化、每一个劳动者主体意识的觉醒，都是向着这一目标推进的具体实践。这是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在当代最深刻的启示：人的本质既不在某种先验的抽象规定之中，也不在于被动接受既定的社会关系，而在于持续地认识和改造那些构成“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本身[8]。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6-16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7.
- [3] 蓝江. 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9): 76-83.
- [4] 佟新.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秩序与主体性彰显[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5(3): 163.
- [5] 黄丽娟, 范宝舟. 主体性的辩证法: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5): 111-119.
- [6] 陈朦. 论数字劳动及其主体性悖论[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5): 35-41.
- [7] 陈咏媛. 数字时代人的现代化困境及破解路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9): 57-69.
- [8] 吴晓明.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命题的实践阐释[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38-45.